

战争孤儿

叶广岑 著

华岳文艺出版社



7.5
3

战争孤儿

叶广苓 著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开本 10印张 2插页 211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

ISBN 7—80549—254—9 / I·190

定 价：4.20 元

内 容 提 要

日本侵略中国，在战败的混乱中，将10000多儿童遗弃在东北等地。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自1981年始，先后有15批1448人赴日寻亲。其中551人经现代科学验证已经找到血亲。这些“战争孤儿”，他们的人生道路浓缩了大喜大悲，他们的生命历程溶铸着情天恨海。当初于血肉弹火中的生死别离，中国母亲替敌人抚养孩子的酸甜苦辣，这一切浸透了战争与和平的血泪岁月。40年后，他们成人了，世界和平了，他们东渡日本寻亲，又一场生死别离发生在北京、大连、长春、哈尔滨……他们找到了亲人，但结果出人意料。比如金静梓，一个漂亮的中国女医师，找到了爸爸，他是富翁，可那豪华的背后却是令人心碎的世界，这世界让她鬼使神差般和哥哥发生了两性关系，之后撞车而亡；还有李养顺，其生父是杀人的日本人，而生父又是让日本人杀的，在这错叠颠倒的历史中，他携带妻小来到生母身边，然而财产的继承，谋生的屈辱，几乎将这条强硬的北京汉子推到生命

极端；还有孙树国、郑丽荣、李秀兰……他们各有奇特经历，各有难言之隐。当然得意美满者有，比如王家模，这位已被确认为五十岚家的大公子，他花20000元抛却了大连的妻子，将自己灵与肉的爱意在异化中消蚀……

前言

1985年我在东京，原本是想利用几个月的时间作一下日本妇女情况的调查，后来却发生了改变，原因竟是由电视引起的。

那天早饭时，我打开电视，恰逢访日寻亲团的孤儿们与观众见面。无疑，妇女们的面容都做了修饰，衣着也较在国内讲究，然而我仍从他们身上辨不出丝毫日本人的痕迹。他们虽没有日本人的风度与气质，却是经国内公安部门和日本厚生省反复确认了身份的堂堂正正不掺假的日本人。这些在中国长大，完全中国化了的，不会讲祖国语言的日本人正操着清一色的东北口音通过电视屏幕与日本观众进行交流，那位日本女翻译不能说工作不尽心，也只能译出大概意思，译不出他们的情感。我扭开电视的时候，一位长春妇女正发表讲话：“……父母亲不认我也没关系，我只求知道我是谁的孩子，家乡在哪儿。自己要活得清楚明白，也给子女们有个交待……”

屏幕上的她在流泪，我的心里也满是酸涩。她在我的心里仍旧是中国人，普普通通的跟我一样的中国妇女。作为女儿，也作为母亲，我理解她的心。

我决定去采访他们。

他们住在何处，如何联系，我茫然不知，无从下手。日子一天天流逝，心内如焚。

我给日中友协的八木庄司先生打了电话，请他帮忙，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八木先生是中国的老朋友，国内不少杂志介绍过他，叶圣陶先生、溥杰先生也都与他有交往，实在的，给他打电话我确实不敢太抱奢望，老头毕竟有老头的诸多事务，再说也上了年纪。

第二天一早，八木先生便提着一大口袋资料来到了我的住处，不单访日寻亲团的住地搞清了，连日程安排，电话号码也问得一清二楚。为了这些材料，他整整干了一宿。

望着老先生略带倦意的面容，我心里一阵发热，看来无论如何是得干下去了，否则对不住他的一番心意。

访日寻亲团第二天要去京都和奈良，能给我提供采访的机会只有一天。走正式渠道采访要通过厚生省办理各样手续，在这里我的身份是外国人。时间无论如何来不及了。恰巧，吉冈喜美子夫人也要去那里，我便与她结伴同去了代代木青少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代表团的驻地。

登记、接洽全由吉冈出面，有她在前面抵挡省了我不少麻烦。我隐去了中国记者身份，与普通日本人一起混入大厅。有人把我当作会讲漂亮汉语的中国通，一位团员说我的汉语讲得比他们省的电视台播音员还标准，我笑笑，大有受宠若惊之感。

在大厅里见到各式各样的人，认识了老李、老郑、老靳等人，谈得很投机。一个小媳妇悲伤地告诉我，她这回是白

来了，没人认她，她的父母大概早已不在人世了。我深表同情，认真记录了她的情况，说一定替她留心寻找。小媳妇挺感激，偷偷问我能不能出去替她买台免税的“卡农”照相机。我这人脸热，心里虽不快但一想人家正在寻亲不遇的痛苦之中便答应了，中途调下采访而直奔了新宿。回到代代木时天已全黑，小媳妇正在餐厅里吃饭，我跟吉冈在外头等。其间碰到与小媳妇来自同一地区的伙伴，说小媳妇的日本妈妈早已找到，已到中国的家中去过数次了，表面上彼此却以朋友相称。我大惊，问为何？对方说，认了就得她妈掏访日路费，化验费，没几十万下不来。她又不打算来日本定居，何苦？

我有些恼，吉冈也闷着头不痛快。倒好，谁也埋怨谁。

狡猾的中国人。

狡猾的日本人。

小媳妇就是后面提到的李秀兰。与她同来的郑丽荣倒是个老实巴交的人，我采访她时，她说第二天她父亲要来认亲，她紧张得不得了。我回国以后，她从东北给我来过好几封信，让我在日本的亲属继续帮她打问，又告诉我，来认亲的那位经验证不是“父亲”。她向我谈了一家6口在国内的生活状况，那个温馨和谐的家搬到日本去也不一定合适，但她又希望能与父母团聚，她的养父母在她很小时便故去了，她拥有丈夫的爱，子女的爱，唯独缺少父母的爱，她要补上，做个十全十美的人。

她满怀希望地盼着，向任何有可能给予帮助的人都伸出求助的手，在幸福中热切地期待着……

或许是永久的期待。

有些事情不好说。

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经济危机终于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

城市拥塞着300万失业者，工业生产一派萧条；米与其它农产品价格的暴跌，使众多农民生活水平下降，苦不堪言。

为转嫁国内矛盾，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移民政策。10年时间内，诸多开拓团、青少年义勇队、各类职员和军队先后开进中国东北、内蒙地区。据日方统计，战败时在东三省居住的有日本居民155万，军队60万。战后回到日本的127万，死亡25万。

由于战败后的混乱，大量日本儿童与父母分离，粗算残留在中国的日本儿童约10000人以上。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自1981年开始，滞留孤儿陆续回日本寻亲，至1987年先后共有15批1448人回国寻找亲人，其中551人判明了自己的身份。

为此，我进行了大量采访，最先接触的是来日本定居的第二代战争孤儿。短短的时间，他们的观念便与父辈有了很大差异，与上一辈即战争的直接受害者之间产生了分裂，他们是回国定居后最为活跃的力量，为他们的父母所不及。

我采访过新潟山地的农家和大企业主，访问过福岛本宫町的普通市民和青年人，更多的时间是在东京奔命；常常是吃完早饭出门，天黑回来，狼吞虎咽地大嚼一气，便整理笔记。两顿饭之间隔了十几个钟点。

采访异常困难，有些原因是可想而知的。外国人对记者似乎并不那么欢迎，不知外国的同行们如何砸了自己的牌

子，特别是听说要写进书里公布于众时，本来如水喷涌的话头便嘎然而止，脸色也不大好看了。实话说，我不能骗人家，不能为了掏出更多的材料而藏起自己的身份，最后又出奇不意地将人家抛出去，那样做太不够意思。我尊重他们，什么可写，什么可不写，谁谁必须用化名，谁谁的住址必须换换……我都依他们，这一切苦衷我都能体谅，换了我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

谁都有难言之隐。

我调查了长野县下伊那郡阿智村，战末，330名开拓团成员开往中国东北，仅3个月，日本便战败，为逃避袭击、自杀、生病，这个村死亡288名，剩下3名大人带着16名孩子逃亡。严寒的冬季，3个人无论如何不可能养活16个孩子，于是潜散到中国人家中，约定第二年春天再到哈尔滨集结……实则，第二年的集结一拖便拖了40年……

我也了解了有名的葛根庙事件。1945年8月14日，日本开拓团1200余人及其子女逃到当时兴安南省喇嘛教寺院葛根庙附近，据说遭到苏联军队十五六门大炮轰击，有的家族用手榴弹自决，当下便死去千余人。有个叫大桦的孩子，被过路的中国妇女救护，可谓死里逃生的幸运者。

“中国残留孤儿”这是个奇怪的，不能细细推藏的字眼儿，这个字眼儿自1980年以来却风靡了整个日本，从北海道到长崎，没有谁不知道这个词儿。当年残留在中国的日本孩子，现在都已成了人之父母，有的已经抱上了孙子，决非能以“儿”来论了。日本人“出于民族的亲爱感”将他们称为“中国未归还同胞”。不料，又引起中国人在字面上的异议：“未归还同胞”，是我们抢了你们的还是怎么的？话得

说清楚。这一说清楚，便出现了“中国残留孤儿”这个不伦不类的叫法，连日本人也说，孤儿们不仅在祖国的双亲有可能健在，就是在中国养育他们的父母也大都健在，叫“孤儿”实在欠严密。

对残留孤儿回国定居的态度，我先后采访了几十人，几乎与我接触过的日本人都被我认真地打问过，其中有工人、农民、职员、学生、家庭妇女、资本家、科学工作者甚至菜铺女老板……人五花八门，态度不一，看法也各不相同。最使我感动的是一次在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的一次聚会上，他们的高桥部长听我讲完战争孤儿们的遭遇后流着眼泪举起酒杯，说“中国人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养育了敌人的孩子，这种无私的爱是举世无双的。中国的母亲是伟大的，是世界母亲的典范。为中国的母亲们干杯！”

日本厚生省1982年6月对永久归国定居的68人的生活实态做过调查，52%是与中国家庭分开以后回来的，其中八成离开了养父母，两成是与子女分离的，一成是与配偶分开而回国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孤儿的回归又造成了新的家庭割裂……在日本，对双亲的抚养属道义问题，法律无法强制。但在中国，依《婚姻法》第十五条规定，“子女对父母负有抚养义务”；《刑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拒绝抚养，情节恶劣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1984年3月17日中日双方达成六项协议，中心议题便是养父母的抚养问题，依着中国人的习惯观点，老有所养的问题不解决，一切认亲都是白搭。

回国定居的残留孤儿要想与日本社会相融也是十分不容易的，要付出艰苦长期的努力。语言的障碍，价值观的差

异，生活习惯的不同，就职自立的艰难，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又一个难题。其中不乏经过努力奋斗取得的成功者，例如李养顺、王家模那样的，当然也有不成功的，1979年8月，岩手县一归国女性因不习惯日本生活而投井自杀；1983年爱知县一回国妇人因语言方面障碍而投身飞奔的列车……对于已死的残留孤儿，我无法了解更多，仅能从报纸的字里行间，从家属讳莫如深，闪烁其辞的谈话中推断出一二。最后我不得不用文学形式对这一事实加以表现了。

更多更细致的工作是在回国以后，将大批材料进行筛选，消化，吸收，仅凭材料写出的作品未免苍白，于是在风雪严寒之际我又不得不从祖国的西北折到东北，走访在国内的残留孤儿和他们的家庭。在哈尔滨，我找到了当年在绥化县处理日本难民工作的赵乃斌同志，采访了手表厂工人访日寻亲团团长杨树国同志，杨树国的妹妹是NHK的记者，兄妹俩是在寻亲的采访中相认的，妹妹受了母亲的旨意来寻找哥哥……感谢他们，无私地为我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素材。沈阳工人报和沈阳公安局的诸同志也帮我搜集材料，协助我一同采访，做了不少工作。

在日本，反映残留孤儿生活方面的书籍、文章已屡见不鲜。中野谦二的《中国残留孤儿问题》，菅原幸助的《不用哭了》以及目前正在《文艺春秋》连载的反映孤儿问题的长篇小说都受到了日本各界的重视和欢迎。

只是日本人谈战争孤儿。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用中国人的心理，用在中国生活了49年的“孤儿”们的心理来反映这一题材的作品却没有。毕竟是两个国家，诸多的条件制约了中国的作家。

我能有此机会，在日本，在中国不受约束地深入各地，应该说是得天独厚的，也是这些，促使我提起笔来……

提起笔竟又感到力不从心，我不是专业的作家，在文学创作上更非佼佼者，一只秃笔，几乎要折断了。

应该感谢我的朋友们，感谢日中友协方面的大力支援，感谢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们，他们知道我，一个中国人，在写《中国残留战争孤儿》，纷纷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各种材料、书籍源源由日本寄来，数量之多、之经常，使得我周围一些同志热心地攒起了日本邮票……这本小书之所以能得以完工，是中日朋友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不过是将大家提供的几个典型人物的素材串成了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

作 者

1988年10月1日

第一章

不管怎么说，终于进来了。

李养顺咽了口唾沫，长长地舒了口气，踏上了白色的石阶。

他没想到，进入日本驻华使馆这么难，费了多少口舌，拿出多少证据也感动不了门口那个中国警察，最后他报出日本籍贯和父母姓氏，经验不足的警察才眼睛半睁半闭地给了通融，这实在是破天荒了……

小时候他常往这儿跑，一天三趟，没谁挡着拦着。那时候这儿还没盖什么大使馆，是一片阒无人迹的乱葬岗子，荒草半人高，风一吹，刷刷地惨人。那坟头，东一个西一个，瘪塌塌的，象发霉搁陈了的窝窝头，磕头碰脑都是人的大腿骨、下颌骨，没点儿贼胆子的还真不敢来，常听说有做小买卖的打这儿过碰见鬼打墙这号子事。他跟三儿、狗子、大摊儿却是这儿的常客，这儿没人，可以蹦着高儿扯足了嗓门骂马老师那个女丫挺的，因为那个女丫挺的成天逼着他们念注音字母ㄅ ㄆ ㄇ ㄏ ㄙ ㄌ ㄋ。什么狗屁玩艺儿！他告诉大摊儿们。这神模鬼道的ㄅ ㄆ ㄇ ㄏ ㄙ ㄌ ㄋ是小日本发明的——他妈针线筐箩里有个夹鞋样子的大书，书上也描着这样的字アイウエオ

カキクケコ。中国人学日本话不成汉奸了？他不学。大摊狗子三儿们也不学，马老师让念，他们就振振有词地：“婆婆摸佛，爷爷饿了……”惹得全班都跟着“爷爷饿了”。老师自有老师的辙，看家的本事是找家长。他妈也有他妈的招儿，一句话不说先抄鞋底子。在李养顺的记忆中，那本写着鬼子话的书底下老压着一只永远纳不完的鞋底儿。屁股上的嫩肉与麻绳勒就的鞋底硬性接触不是件愉快的事，产生不了任何幸福的美感，更何况与此同时还伴着一通劈头盖脸醍醐灌顶的臭骂。事完之后，他和那小哥儿几个总要聚在烂坟地，将在鞋底下积聚的能量释放出去，不骂个花哨干脆不解恨。

坟地东面是日坛，有皇上那会儿是祭太阳的地方。比那天坛可差远了，大概自打建成以后一个皇上也没来过，颓垣败壁，破得连李养顺这样的人都不屑一去。坛西北角，紧靠他们学校南墙有个大碑挺醒目，碑上写着“马俊烈士之墓”，还刻着红五星儿。凭他和三儿、狗子肚里那点水儿，只认得出个“马”字儿，这还是沾了那个“女丫挺”的光，因为她姓马。于是断定，这下头埋的准是“女丫挺”的爹，冲她对日本文的那个孙子样儿，她老子是断无脸活在世上的。

他在这块地界儿逮过蚰蚰儿，翻过骷髅，套过野狗，装过吊死鬼儿，练过拳，拉过屎，后来知道搞对象了，便把自认为班上最可心的女孩儿刘梦莲朝这儿领……这儿是他的领地，他在这儿打滚儿比在家里的炕头上打滚儿还舒坦自在。

李养顺擦擦脸上的油汗，推开了那扇沉重的茶色玻璃门。凉气由里面吹出，带着一股似香非香，似药非药，在中国压根就没闻过的气息，大概就是日本味儿了。许是闻了这

陌生气味的缘故，他停住脚步，慌惑地回过头去——大使馆的花铁栅栏外，“马俊烈士”的身后头隐着他老婆刘梦莲。梦莲一手扶着儿子胜利的膀子，一手扯着4岁的丫头卫红，正伸着脖子朝这边看。高大的柏树，青森的石碑，晃得娘儿几个的脸疹疹地发绿，让人想起戏里的秦香莲来。他朝“马俊烈士”扬扬手，做出了满不在乎的神气，那边大手小手立即以极高频率挥动起来，后来还加上了小手绢儿，到底是女人，心思太重，为今儿这事昨天夜里足足跟他闹了半宿，坐起来躺下，差点儿没把床板砸塌了，死活一句话，不许他上这儿来。

凭什么不来？又不是当汉奸里通外国，又不是牵线接头私奔海外，怕什么？爷们儿家，讲究清白刚正，什么事儿，摊上了，不推；不是，也甭想往他头上扣屎盆子。李养顺不是瘪茄子。

当然，这些事儿的起因还是他妈那本夹鞋样子的日文书——

红卫兵破四旧，根本没他们家什么事儿，他们老李家是两代老贫一代工，打老祖宗那辈儿就闯关东，父亲挖煤，先在抚顺后在京西门头沟。“汗水流尽难糊口，地狱里头度岁月，不知冬夏与春秋”，绝对是那样子，他妈说柯湘是唱他爸爸呢。1950年他爸爸死于矽肺，干一辈子矿工的主儿，不是砸死就得栽在这病上，可惜的是刚赶上好日子头儿。挖煤的爹实际是他继父，他妈说他亲爹是离哈尔滨不远芳井圪的农户，1945年日本撤退时让鬼子机枪扫了。虽说是农民也是殉了国难的，做儿子的也是时时不可忘记的。这也是他恨日本的一个原因，杀父之仇哪！忘了，叫什么爷们儿！打小他就

盼着中国侵略日本，他好在小鬼子的地界儿也杀他个昏天黑地，就跟与狗子们打架似的，一比一平，谁不欠谁的，然后再讲什么友好。

他妈拉扯他不易，老太太没文化，全凭给合作社做补花。补花是北京一绝，尤以朝阳门外头的最为出色，大闺女小媳妇谁都会。做时先把色布后头贴上纸样子，再沿着样子把布一块块剪下来，抹上稀浆子拿扁铁棍儿把毛边往里拔，粘成各种花瓣，再把花瓣拼凑成一朵或数朵完整的花，粘在桌布、碗垫上，用各色彩线锁边……一个人往往很难完成全过程，多是由合作社组织起来，有人做花，有人粘花，有人针黹。发活的日子一三五，各领各的料，拿回家去干，不耽误家事。吃完晚饭，一家大小一齐上手，掷骰子斗十胡般地开心热闹。二四六交活，大小包分类，花梗、花朵、枝叶按类验收，论张开钱。李养顺的母亲是做补活的，就是把粘上花样的各类布料缝制成品，一件大桌单的工钱是五毛，老太太一个月至多缝十几件，挣七八块钱，日子紧巴巴的。他妈是要强的人，那时候正抗美援朝着哪，街道上积极分子成天动员捐款。人家常香玉一张嘴捐了一架飞机，谁人不敬佩？同是老娘儿们家，他妈一咬牙把家里的座钟端出去卖了，换回一张纸片贴在墙上，逢人就说，也为打大鼻子出过力啦！老太太别的不懂，只认一个理儿，大凡侵略人的，准不是好东西。过了没几天，国家又号召啦，“吃窝头啃咸菜，千万别忘了买公债”，他妈愣是勒着裤腰带从牙缝里省钱，买回15块债卷儿，没钱就翻出来瞅瞅，过过钱瘾。

干什么都怕落后，“文化”一革命，老太太就动了心

思，寻思沾了文化边儿的都不是好的，听完动员报告，回家就一通翻，儿子的中小学课本，铰来的鞋样子，墙上的年画儿，交活取活的单据，都交出去了，也包括那本カキケコ。

麻烦事儿来了，来了伙子人，为首的是街道治保主任黄文英，外号叫大马牙的，她拍着那本日本书非让老太太讲清来历。李养顺想，凭着一本破书料也定不了什么里通外国的罪，何况他妈苦大仇深，跟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就鼓动着让他妈实话实说。谁料，他妈死活不张嘴，硬让那帮人围在中时推来搡去。老太太越不说话问题越严重、越复杂，当下便有人提出潜伏下来的女特务之类的严肃问题。老太太属鸡的。一推算，抗战全面爆发那年整27，27的女人不当特务当什么，电影上的女特务都是这个岁数。立时，有人拿来了推子，要给老太太剃阴阳头。老太太拿胳膊护着脑袋直往下蹲，李养顺扯过黄文英的脖领伸开巴掌就要扇，上来几个穿黄军装舞宽皮带的，甩着膀子左右开抡，也不管是李养顺还是黄文英，尽在皮带弧线之中，不得逃脱。媳妇刘梦莲敢做敢为，挺着即将临产的大肚子扑上去一把抱住老太太，劈着嗓子喊：“谁再动手我操他姥姥！”

穿黄衣裳的红卫兵头儿问是谁家娘们儿，大马牙黄文英用手捂着被抽肿的嘴唇说是李老太太的儿媳妇，东城织袜厂的工人。又打听出身，说是小业主。这下糟了，三五个半吊子男女一拥而上，把媳妇按在地上，肚子朝下，又骑上去一位，拿过推子便给剃头。梦莲在底下破口大骂，操了几遍在场所有人的十八辈祖宗也不顶事儿。大马牙自有绝招，伸出手去拧梦莲大腿里联儿。李养顺红眼了，抄起菜刀就往骑在